



发展与改革丛书

历史与乌托邦

——历史哲学：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

• LISHIYU
• WUTUOBANG



衣俊卿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fazhanyugaige

HU

95544



发展与改革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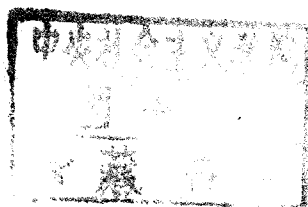
历史与乌托邦

历史哲学：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

衣俊卿 著



200204126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5号

历史与乌托邦

——历史哲学：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

衣俊卿 著

责任编辑：崔伟奇

封面设计：孙少江

责任校对：无 为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7.75·字数 182 千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810

ISBN 7-5316-2835-X/B·43 定价：8.00 元

《发展与改革丛书》

总 序

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一个社会,生产力越不发达,经济文化越落后,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则越小;反之,生产力越发达,经济文化水平越高,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越大。人类的出路,在于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这一套丛书命名为《发展与改革》。

积中华人民共和国 40 年之经验,我们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富国富民的唯一正确道路。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客观基础;照搬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此路不通。我们经过三十多年的痛苦摸索,终于找到了这条光明大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有两块基石,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离开了这“两论”,也就没有中国特色了。为了达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持续提高,逐步赶上发达国家。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大方向、大原则确定了,但是,怎样达到既定的目标,有许多艰

DQ71/22

难的工作要做。例如，怎样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怎样把发展速度与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一致起来？在改革方面，最大的难点在于找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最终目标的途径、形式、步骤、方法。不少学者和企业家都指出了“承包制”不可避免带来短期行为、负盈难负亏等副作用，但是，又不可能一下子都变成股份制、合作制。那么，在承包制与股份制、合作制之间怎样找到一种过渡形式呢？诸如此类的有关发展与改革的重点问题，有待大家苦心探索、深入研究。

出于历史责任感，我们龙江学派的一些学者高兴地接受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委托，计划在三五年内编辑出版一套《发展与改革》丛书。这一套丛书不是代圣贤立言，或者注解现行政策，也不是单纯介绍外国的学术思潮，而是立足于本国，探讨发展与改革中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略尽绵薄之力。

我曾经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张文达社长有一段对话：

我说：要不拘一格出好书，题材不拘一格，观点和文风也不拘一格，唯新唯好。

张社长答：我社要不惜赔钱出好书！

在今日一片赚钱声中，我们听到这种支持学术事业的声音，是多么惊奇，又多么兴奋啊！不少乡镇企业超过国有大企业，同样，小出版社也可以干出大事业，只要有这种为发展学术事业不惜赔钱出好书的方针。

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曾经说过：“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本丛书的作者似乎比傻瓜还高明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呢？

熊映梧

1992年1月于冰城

目 录

引 子	人的历史与神的历史	(1)
第一章	人的存在与“乌托邦定势”	(7)
1.1	人之主体性的定位:自然性 与神性之间	(12)
1.2	人之主体性的内涵:自由·孤独·超越	(20)
1.3	乌托邦定势与乌托邦历史设计	(31)
第二章	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解析	(40)
2.1	乌托邦历史设计的深层构架	(43)
2.2	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之一:希伯来精神	(48)
2.3	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之二: 传统理性主义和技术理性主义	(54)
2.4	乌托邦历史设计范例之三:传统社会主义	(63)
2.5	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要害	(77)
第三章	神的兴衰与沉浮史 ——西方文化演进历程巡礼	(83)
3.1	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 人之初次觉醒	(85)
3.2	大一统的帝国与教会:人之失落	(92)
3.3	“上帝之死”与技术理性的统治	(99)
3.4	技术理性主义的幻灭	(109)

3.5	技术世界中人的生存困境	(115)
第四章	极限意识的生成	
	——人之真正的觉醒	(132)
4.1	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康德批判 哲学的启示	(135)
4.2	悲剧意识:现代人本主义的深沉内蕴	(143)
4.3	批判意识:马克思学说的灵魂	(151)
4.4	解构哲学:后现代主义的激进否定精神	(167)
第五章	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	(177)
5.1	乌托邦的衰竭与新历史意识的生成	(178)
5.2	历史的终极关切——总体的人	(192)
5.3	历史进步的多重价值尺度	(203)
第六章	新历史意识的价值学维度	(213)
6.1	人之有限与无限	(214)
6.2	人的自由与历史的自觉	(220)
附 录	论人类精神的跨世纪走向	(224)
参考书目		(238)
后 记		(240)

引 子

人的历史与神的历史

翻开扑朔迷离的人类历史画卷，我们不但为其中那些巧夺神工的杰作和创举所吸引，也常常为其中那不息的、躁动的精神涌流所震撼。在历史的每一时刻都交织着那一时代人们美好的愿望、崇高的理想、虔诚的信念、炽热的情感、坚强的意志、不可遏止的冲动、难以填平的欲壑、不顾一切的追求、难以泯灭的渴望、躁动不安的欲念、无穷无尽的希望……。同时，伴随着这巨大的历史热情的投入，还有深思熟虑的谋划、雄心勃勃的宏图、深沉冷静的理性设计，等等。各个时代的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懈地追求历史的自觉，追求历史的属人性性质。这一切使人类的历史裸露出不可抹煞的思想内涵，以致于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作出“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的著名论断，另一位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同样明确无误地断言：“精神即历史”。克罗齐是这样展开他的这一著名论断的：“除非我们从这样一个原则出发，就是认定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在它存在的每一瞬间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全部过去历史的结果，我们

对历史思想的有效过程是不可能有任何理解的。所以，精神含有它的全部历史，历史和它本身是一致的。”^①

然而，从人类历史活动的结果来看，历史演进并非只为我们提供人间喜剧。相反，它不断残酷无情地挫败周密的设计、粉碎美好的理想、惊醒一厢情愿的幻梦。于是，在遥远的理想与冷酷的现实之间，在充满热情的历史投入与不遂人意的历史产出之间，似乎总是横亘着一条巨大的裂谷。这给人之脆弱的、然而又饱含难以泯灭的希望的心灵带来巨大的痛苦，它常常在敏感的心灵上挤压出痛苦的历史意识。各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常常表现为对人之未来的无条件的信念及希望同对人之境遇的彻底幻灭的交替，表现为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和绝望悲观的轮回。

人们曾无数次地引证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对罗森格兰兹所说的那段赞美人类之伟力和灵气的千古佳句，以论证那一时代的崇高而庄严的人文精神、那种对人的无限信念和积极乐观的格调。但是，人们往往忽略或回避一个重要的事实：就在人们断章取义地引证的这段佳句的上文和下文，却表达着完全不同的心态和情绪：对人类的毫无信心和绝望。当我们从头至尾地品味一下哈姆莱特的那段话，就会发现，那种对人的乐观信念和绝望悲观相互交织的矛盾的历史心态立刻跃然纸上。哈姆莱特如是说：

“我近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点兴致都提不起来，什么游乐的事都懒得过问；在这一种抑郁的心境之下，仿佛负载万物的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这个覆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3 页。

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不，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①。

然而，尽管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投入与历史产出的反差不断展示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不断产生出痛苦的历史意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遏止住人类历史的精神涌动。恰恰相反，这一挑战激起了各个时代的心灵的更加顽强的应战。人们依旧执着于历史的自觉性，不断以新的历史设计取代已被挫败的历史设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历史的困境，历史理性开始在有限的人之外寻找各种超人的实体或力量，把众神置于历史设计的中心，把人的命运交给非人的或超人的力量来执掌，企图通过这些实体或力量的劳作而满足人们达到完善完满境界的永生渴望，以保证既定历史目标的实现。于是，传统的历史设计（历史观）带上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它们陷入一个严重的误区：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设计和创造，而这一切历史努力和历史设计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历史投入与历史产出的反差。众神（各种超人的实体与力量）在历史沉浮中的相继衰落，又会不断地把人们从希望和乐观的顶峰抛到绝望和沮丧的深渊。结果，人们世代渴望的自觉的历史迄今为止一直没有真正生成。

要使历史达到自觉，则必须彻底走出传统乌托邦历史设计或乌托邦历史观的误区，使神的历史回归人的历史，把人的命运从神的手中交回到人的手中。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极有必要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确立一种超越乌托邦历史设计的基本构架的新型历史意识。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菲伏尔在 1938 年发表的《辩证唯物

^①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51—52 页。

主义》一书中曾明确地表达过这一历史要求。他断言：“即使在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的今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是自己造成的崇拜偶像的牺牲者。偶像的存在真是离奇，它既抽象，又真实，既是物质的又裹着富有魅力的思想意识，有时甚至是迷人的思想意识的外衣……。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清晰的、坚韧不拔的、善于提出问题的意识来揭露这些偶像，防止思想混乱而丧失理智。”^①

当然，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历史是一个永恒的开放过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在理想与现实、历史投入与历史产出之间直接划等号，只是从一个开放的过程来看，二者之间才可能达到某种和谐与一致。但我们同时也清醒地看到，迄今为止在历史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对未来的盲目乐观和绝望悲观相互交替的社会心态并非根本不可改变、不可优化，而理想与现实、历史投入与历史产出之间的这种强烈冲突与反差也并非人类历史的永恒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既是人类技术和物质生活水平低下阶段的产物，又同传统乌托邦历史观和人们习惯的乌托邦定势总把人的历史当作神的历史来创造这一失误直接相关。这即是说，在人类历史的进一步演进中，人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和某种意义上逐步摆脱和超越人的历史活动完全受制于盲目的经济必然性、社会异化力量和超人实体的状态。

由此可以断言，我们试图确立的超越传统乌托邦历史观的新型历史意识，并不是要在结果的意义上—劳永逸地清除理想与现实、历史投入与历史产出之间的冲突与反差，而是要把历史关切的聚焦点放在人的身上，把历史从神的手中归回到人的手中，通过人

^① 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的主体意识、批判意识、历史参与意识和本质力量的增强,而使人能在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越来越自觉地把握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历史投入与历史产出之间的关系,能够自觉地承担起自由自觉地创造历史的重负,能够在任何恶劣的社会条件下或在任何有限的可能性阈限或空间中创造价值和意义。

为此,有必要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和价值学等多重视角确定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的确切位置,把握人的潜能和人的极限、人的命运和人的未来;批判地反思人类历史上和现今各种乌托邦历史设计的误区,以及历史和文化的演进机制;确立以人的自由和沉重的历史责任为双重内涵的新型历史意识,即以总体的人为基本内涵的新发展观和新历史观,一种走出传统历史设计之误区的新历史哲学。

上述我们所表述的重构历史哲学的设想,实质上表达了重写历史的意图。因为新的历史设计或新的历史意识,必然导致对于历史的重新阐释。实际上,任何时候,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像德国实证主义史学家兰克所追求的那样,对可靠资料做不偏不倚的理解和绝对客观的叙述。我们所接受的任何一种历史总是特定时代人们从特定文化和条件出发,依据史料而做了特定阐释的历史。而正因为如此,历史才不是“死人的王国”,而是同现在密切相关的、未完成的、活生生的东西,它才能在现代思想光芒的照耀下而成为现实和未来生活的组成要素。在某种意义上,过去的历史同现在的历史及未来的历史一样,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生成的进程。因此,我们在今天重新提出重构历史哲学和重写历史的设想,绝不会是一种狂妄的或无谓的举动。

实际上,许多现代思想家都明确表述过必须不断重写历史的思想。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反复强调历史的思想内涵,把历史视作过去的思想的重演。从这一基本见解出发,他断言,“每个新的

一代都必须以其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位新的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对老的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就必须修改这些问题本身，……甚至于一位从事一般特定时期的一个单独题目的历史学家，在其试图重新考虑一个老问题时，也会发现那个问题已经改变了。”^① 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同样明确地表达了不断重写历史的思想。他指出，“历史当然是一切都应改革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力图使自己变完善，就是说，它在丰富着自己和更深入地探索自己。没有一部历史能使我们完全得到满足，因为我们的任何营造都会产生新的事实和新的问题，要求新的解决。因此，罗马史、希腊史、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法国革命史、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其他一切题目的历史总是经常被重写，总是重写得不一样。”^② 甚至科学哲学家波普从另一种哲学立场也提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他把必须不断重新书写历史这一要求表述得更加明确无误。他指出，“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己的解释。每一代人不仅有权利，并且也有义务去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迫切的需要等着解决。”^③

由此可见，必须不断重新书写历史这一见解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当代历史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共识。因此，无论我们对上述历史哲学家的哲学立场和具体观点是否接受，我们都可以采纳他们关于不断重写历史的见解。可以说，正是为了人之现存和人之未来，我们有必要重构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并重新关照人类的文化和历史。

①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页。

②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页。

③ 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载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第一章

人的存在与“乌托邦定势”

生活在 17 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深深地迷恋着人这个“自相矛盾”的神秘的存在物。他发现，人脆弱如芦苇，但却高贵而伟大，因为他知道生与死，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他关于“思想形成人的伟大”的论述成为以后几个世纪许多哲人反复引述的精妙而深刻的思想。今天，当我们再一次探寻“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一亘古之谜时，无法不再一次从帕斯卡尔的这段结论开始。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

因而，帕斯卡尔得出结论：“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

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①

哲学人类学创始人、著名德国哲学家舍勒在时隔二三百年之后，又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了帕斯卡尔的这一思想。他在其代表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再一次表达了人的地位的双重性。他发现，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人这一高级存在形式在力量上或本能上同低级存在形式相比并不占优势；相反，“从根本上说，低级的是强大的，最高级的则是孱弱的”。但是，人并不因此而失去价值，相反，“人是比他自己和世界都优越的存在物”。这是由于人的自由和对象化存在方式决定的，即是说，精神成为人与万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舍勒总结道：“按照原始关系，较高级的存在形式是较弱的，而较低的存在形式是较强的。换言之，原本孱弱的精神和原本强大的、即与一切精神的观念和价值相比盲目的欲求，通过不断演变，使隐藏在万物的表象后面的压抑〔Drangsale〕变成精神和观念而相互渗透，同时使精神变得生机勃勃，并赋予它以力量。”^②

的确可以断言，人这一如此脆弱的存在物，能够成为万物之灵，成为历史之主体，首先仰仗他所独具的规范万物、反诸自身的自我意识。无论是在惊异和恐惧之中审视着广袤无垠、神秘莫测的宇宙，还是在冥冥黑夜之中跪拜在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人总是难以摆脱那永恒的自我相关的困惑：“我是谁？”“我来自何方？又将魂归何处？”

从洪荒远古时代扑朔迷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经过古希腊时期阿波罗神庙上“认识你自己”的警世箴言和那困惑千古的司芬克斯之谜，到当代震撼世人心灵的存在主义运动，人成为神话、艺术、宗教、哲学和科学无可争议的永恒主题或轴心。人类的理性曾

① 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7—158页。

② 马克思·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5—66页。

一次又一次地试图为人这一千古之谜提供真正的题解或谜底。

生理学家把人当作有机体来研究,生物学家把人当作物种来研究,人类学家把人当作种族来研究,社会学把人当作社会存在来研究,神学家把人作为神之造物来研究,艺术家把人当作审美对象来研究……。至于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对人的本质问题就予以更大的热情和关注。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采取了同一方式:或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区别于动物或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某一突出的特征,例如,人是理性的存在物,这代表了一个古老的信念,到近现代,人们则提出人是意志的存在物、人是直觉的存在物、人是符号的存在物,等等;或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于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活动的某一层面,例如,亚里士多德曾断言“人是政治动物”,而后人则提出人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存在物等各种命题。这些不同的界定,分别看来,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从不同的侧面加深我们对人的理解。但是,在这里,我们始终没有获得关于总体的人的知识,即关于人从总体上如何区别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知识。

应当说,上述情形既是人们探讨问题所特有的不同思维方式的结果,也与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开放的和多维的(多向度的)存在物这一事实直接相关。可以断言,只要人依旧存在,只要历史依旧延续,那么对人这一司芬克斯之谜还会有新的解答。类似的谜底将会是无穷的,而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具有终极的和绝对的意义。正因如此,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必急于为人的本质问题再提供一个新的谜底,而可以另辟蹊径,以加深对人的理解。

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事情是对人的存在形成一种总体的理解,而不是给出一个具体的界定。这种关于人的总体性理解有助于我们扬弃现有的各种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对于人的总体性理解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理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人

的总体或总体的人在历史和文化中现实生成的问题。对此,20世纪许多思想家都有深刻的认识,总体性问题和总体性意识在现代哲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著名捷克哲学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西克在著名的《具体辩证法》一书中,从实践哲学的立场出发,分析批判了人的异化的和自在的存在方式,从而把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即人的总体性存在置于历史的中心,置于哲学探讨的中心。他明确指出,“辩证法探寻‘物自体’。但是‘物自体’不是普通的物,确切说,它根本不是什么物。哲学探讨的‘物自体’就是人及其他在宇宙中的位置,换言之:它是人在历史之中揭示的世界总体和存在于世界总体之中的人。”^①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列菲伏尔则更加清楚地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强调超越作为异化的存在物的人,即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支离破碎的人之存在,而把总体的人,即自由自觉的人当作历史的目标。列菲伏尔对于总体的人作了较为详细的界定,他指出,“总体的人是变化的主体和客体,它是与客体对立并克服这种对立的有生命的主体,是被分成许多局部活动和分散的规定并克服这种分散性的主体,它既是行为主体,又是行为的最后客体,甚至是行为在生产外界客体时的产物。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主体——客体,是起初被弄得支离破碎,后来又被禁锢在必然和抽象之中的主体——客体。总体的人经历了这种支离破碎走向自由,它变成自然界,但这是自由的自然界。它像自然界一样成了一个总体,但又驾驭着自然界,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②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在把握人

^① Karel Kosik: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 Boston: D. Riede, 1976, p. 152—153.

^② 列菲伏尔:《辩证唯物主义》,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